

卢卡契谈话录

伊斯特万·艾尔希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卢卡契谈话录

[匈牙利]伊·艾尔希 编

郑积耀

潘忠懿 译

戴继强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tván Eörsi
Georg Lukačs
Geliebtes Denken
-Eine Autobiographie im Dialog

本书根据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1年第1版译出

卢卡契谈话录

(匈牙利) 伊·艾尔希著
郑积耀 潘忠懿 戴继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327-0687-7/I·344

定价: 3.00元

目 录

伊斯特万·艾尔希：最后一句话的权利 ·····	1
过去的思想(格·卢卡契谈他的生平) ·····	24
第一章 童年时代，就业初期 ·····	27
第二章 战争与革命 ·····	53
第三章 流亡时期 ·····	90
第四章 重返匈牙利 ·····	154
人物简介 ·····	200
后记 ·····	228

伊·艾尔希

最后一句话的权利

I

格奥尔格·卢卡契在脱党十年之后于一九六七年重新获得了党证，这是他一生中新的转折点，他觉得有必要就此发表一项声明。一九五六年事变期间，他毕竟是一位文化部长，以后，他也未曾同那些一起被遣送到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员公开绝交，说得客气点，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尽管大话说尽，却经不起拘留隔离的考验。一九五七年，卢卡契本人被准许返回布达佩斯，但这里称他为“意识形态最危险”的人物，他的作品不允许在匈牙利出版，而且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它们在国外发表。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准备工作才开创了新的局面，即使在这样一个清洗斯大林主义的时期里，似乎也不可能继续把格奥尔格·卢卡契视为宣扬精神污染的主要人物。此外，在党的领导阶层中，持下述观点的占上风：建议还在卢卡契逝世前与之言归于好，以免重蹈另一位卓有名望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冤假错案的覆辙，即阿蒂拉·

约瑟夫事件。阿·约瑟夫在三十年代初被开除出党，在他死后才不得不采取各种歪曲事实的手法与他和解。

“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听说，我已重新成为一名党员了？”格奥尔格·卢卡契带着他那特有的讥诮的侧视目光问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开始就作出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作了说明。首先，经济改革从客观上促使观点上的接近，尽管他认为改革计划仅仅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党却把它视为非常激进的措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在政治结构未作变动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不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党只想局限于经济改革，然而，通过改革也许可提供很多对话的可能性。作为第二个原因，他列举了对他学生们的考虑。他自己可依靠哲学而生存，至少可在国外发表他的作品，不至遭到官僚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他的学生们却相反，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大多数人已被剥夺了发言权，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的聪明才智无法施展。现在有人向他许诺，在澄清党籍问题的同时，将一并解决他的学生问题，他们可作为科学工作者获得工作位置，并有发表作品的可能性。格奥尔格·卢卡契对第三个原因特别引以自豪，有人向他担保，他可保留思想上的独特见解，在适当的时候也可发表演说，这就为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前景，开辟了重新施展影响的可能性，他可无需作任何妥协，以思想家的本来面貌出现在党内。当我倾听了全部论述以后，我问他：“按照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说，并不是卢卡契同志重新入了党，而是党迎合了卢卡契同志的思想？”卢卡契又带着他那调皮的侧视目光回答说：“遗憾的是这样论述也许还为时过早。”

II

我们俩都知道，上述三个原因可能已成为历史性的声明，它们只是反映了一种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需求，格奥尔格·卢卡契也是这么严肃地认为的。当卢卡契在一九五七年从罗马尼亚返回匈牙利以后，他立即写信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声明他将继续把自己视为一名党员，可是他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很显然，即使在反卢卡契的一片鼓噪声中，谁也没有勇气签署一封拒绝他恢复党籍的信件，“我好像是一根卡在他们喉头的鱼刺，”卢卡契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既无法把我吞咽，又无法将我吐弃。”后来，他在一本百科全书里发现，说他已被开除出党。百科全书中的这一词条，是他过去的一个学生写的，名叫约瑟夫·奇格蒂。卢卡契对此人的评价是：“他表达了一个唯一独特的、不是从我这儿抄袭的思想，即：有人想逼我退休。”

这一百科全书的词条不能被理解为公开的答复。尽管卢卡契对此谈笑风生，但在内心里却深感痛苦，党籍问题对他来说可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啊。“不论正确或错误，她总是我的党呀！”此话出自一个哲学家之口，令人感到颇为奇特，可是他以此来说明：即使在大清洗时期，他也未曾反抗过斯大林主义，灵魂深处也未叛逆！当然，他也通过列举各种历史原因，对此表示过支持，例如，他对《新生活》杂志曾发表过一次采访谈话，这篇谈话在卢卡契逝世以后的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号上才发表。在这次谈话中，他特

别重申了自己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才能有效地对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今天我仍坚持这一观点。”格奥尔格·卢卡契是阿蒂拉·约瑟夫和曼氏兄弟^①的忠实崇拜者，一九七〇年前后，他在大批免职的事实面前，只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才坚持这一观点。他也多次声明：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冲突期间，出自道义上的考虑，对苏联的任何批评都必需推迟。但是，如果说当时是这样情况，那么为什么他后来没有打破沉默呢？在返回匈牙利以后，甚至在狭小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内——这些共产党人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切身经验而了解苏联——他的言行举止，反映出他对肉体上和精神上所经受的可恶桎梏，对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对称之为死刑所的劳改所等等，一句话，对朝着斯大林方向发展的苏联，为什么好象一无所知呢？再引证《新生活》杂志上的下列句子，可以得到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我一向认为，即使生活在最差的社会主义形式中，也要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形式强得多。”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期《新型笔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他更加客观地表达了同一内容：“但是，即使最差的社会主义，还总是比最好的资本主义强。乍一听，似乎这只是一种奇谈怪论。”谁若代表这种观点，不需要有特殊的历史原因或道德上的考虑，就可成为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方向的执政党的党员。

卢卡契精神上的需要，也可说是宗教信仰的需要^②，我认为一方面由其家庭出身所决定，另一方面是他的知识分

^① “曼氏兄弟”是指德国近代名作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

^② 作者注：据我所知，两位匈牙利哲学家——吉奥尔吉·本塞和雅诺斯·肯斯，首先论述了关于卢卡契共产主义的宗教因素，该论文至今尚未发表，它试图在卢卡契逝世以后说明他们与卢卡契的关系。

子地位所决定的。他作为一个非常富裕的银行家儿子，对父母家的道德和书生气——他习惯于称之为“礼节精神”——很快失去了信心，他非常强烈地渴望参加某一个有意义的大团体。党作为觉悟阶级的代表——或可称之为“世界精神支柱”——尽管有时也走些弯路，却实现了“本阶级的利益”，个人利益首先作为阶级利益的组成部分，逐步上升到本阶级利益的高度。另一方面，对卢卡契来说，由于他唯心主义阶段的科学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以及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聪明才智，使他一开始就无法顺利地适应等级森严、建立在严密纪律和强制措施基础上的运动。众所周知，托马斯·曼所描写的那个纳夫塔，引用了格奥尔格·卢卡契的部分思想，他对这种精神状态和情况反映出来的棘手的、可以说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描绘得有声有色。纳夫塔是一个耶稣信徒，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致力于世界大同组织的思想先驱。由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虽然他处身于运动之外，但他却全力以赴地为运动贡献力量。尽管运动向他作了自由的保证，但他却受到运动的怀疑和监视，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他自己提出了大胆的方案所导致的，他的方案被视为异端邪说，直接危及最终的福音。卢卡契不是耶稣信徒，并与运动保持必要的距离，由于运动受当时策略考虑的支配，并要求有策略所需的纪律，因此，这就使他这位理论家经常与运动处于对立的地位，并面临着被清洗的危险边缘。因为他是一位理论家，对这种情况他用所谓游击理论加以回答。一九四五年，他在论述党的诗歌时对这^一理论作了最全面阐述：“党的诗人从来不是领导人，也不是普通一兵，而始终是一名游击战士。这就是说，如他是一位真正的党的诗

人，那么，他与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与党所制定的伟大战略路线应始终保持一致，在保持这种一致的范围内，他得用自己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责任。”从这篇文章的激情和表达的广度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哲学家，涉及到格奥尔格·卢卡契本人。在另一个地方他着重谈了自己：“因此，为了实现我的科学思想，我不得不开展一种特殊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理论在党内很少有人赞同，它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运动和哲学家之间的距离。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围绕着游击战争理论展开了一场辩论，其目的是摧毁卢卡契的思想阵地，消除其思想影响，把它作为无法容忍的绊脚石搬走。在这场辩论中，为了避免开除出党，卢卡契按惯例作了表面上的自我批评，这位游击队员在受到长官们的严厉注视时，总是把手枪藏在背后。联系到党的诗歌，他称之为“忠诚”，对其评价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他自己的生平巨著，及其所显示的智慧 and 道德威望。他写道，在资产阶级文学中，“忠诚”往往只是一种病态的、宗教式的情感，“而党的纪律则相反，它是忠诚的高级、抽象阶段。一个人的忠诚在公开场合表现为：对任何一种历史发展方向所持的看法和态度——即使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它与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完全一致，也得保持着忠诚的态度。”但是，当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决定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发生争论时，那么，对忠诚将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譬如说，一个哲学家曾忠诚地支持过的工人委员会革命体制，一旦被官僚主义的警察机构所解除，那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对命名和口号是否能继续保持坚定不移的忠诚问题。但若这位忠诚的人物正巧是一个具有特殊才华、富

有想象力和充满活力的哲学家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把这种忠诚置于世界历史的前景之中加以考虑，并以意志、信仰——即宗教道德——来填补现实与远景之间的鸿沟。然而，格奥尔格·卢卡契对批评却过分敏感，使他面对强权政治无法心平气和地使用这一思想武器。他在以往的日子里，曾经受过两次风险，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八年，但他都不承认失败。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在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布拉格后不久，我曾听到他亲口说过以下一句话：“也许一九一七年开始的全部试验已告失败，必须重新在别的地区进行一次全过程的试验。”尽管他从未再重复过这句话，从未以书面形式加以表述，甚至在他最后几次并非为公开发表而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未谈及上述观点。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也许是入侵的恶劣后果对他过去五十年的生涯起着相反的作用。为此——卢卡契的忠诚竟会变得如此令人不快——他研究了有关苏联问题的理论，认为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并不典型，他强烈要求“改革”和“复兴”马克思主义。这一改革和复兴的要求，在“回归马克思！”的口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为了对过去几十年的运动给予一定的评价，这种回顾是适时的。但是，他同时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直接与马克思作了极不愉快的对比，在现代条件下实现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一种要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即使有着最美好的愿望，似乎也难符合这一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公开违背这一要求。鉴于上述情况，卢卡契感到进退维谷，当他用“回归马克思！”的口号回敬历史的严重打击，而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开始对这个口号所包含的任务加以详细阐明时，当他由于对现实的疑

惑突然把自己的忠诚转向过去（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时期等等）和未来时，他制订了一个批判性的方案，这一方案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构思，与他的生活和工作融合在一起，在此方案中只有唯一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才符合他的信念：这一信念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设想，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上、经济政策上和组织上的改革，有可能使目前少得可怜的马克思精神转变为马克思的未来。

III

当卢卡契在逝世前几个月着手撰写《过去的思想》自传提纲时，他试图勾划出：他几十年的生涯受着这些努力和倾向所支配。这儿的工作条件极不寻常，几个月来，八十六岁高龄的卢卡契清楚地知道，他身患癌症。当有人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问道，他还可不受干扰地工作多久，他无论如何想把那本《实体学》著作加工完毕，对此他已花尽了最后几年的心血，遭到了他几个学生的严厉抨击。虽然这项工作进展极为缓慢，这可不能首先归罪于他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作品的结构以及历史与方法篇章的截然分割，使作者几乎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加之一九六八年出现了无可挽救的前途渺茫的局面，犹如拍照时摄影物受到晃动，人们对时局捉摸不定，这就使得年迈的卢卡契在创作中本来就存在的（保守的）体系与（先进的）方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此外，病魔破坏了他那令人倾慕的机体，这并非是癌症所造成的恶果，而是老化过程迅速加剧，使得体力和精力受到

严重影响。几个月以后，即一九七一年初，他不得不承认，他对《实体学》的评论已无能为力。可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有工作似乎就无法生活，为此，他的学生建议他写一部自传。卢卡契早有此想法，他那一九六三年去世的夫人格特鲁特·波尔特施蒂勃也督促他写一部这样的作品。然而，当时他对搞这项工作还犹豫不决，因为他不想干没有把握的事，不愿单凭自己的记忆力，可是，他再也没有精力通过查阅文献、图书资料和杂志来证实自己的记忆力。由于感到时间越来越逼人，他终于着手从事此项工作，在短时间内，他提纲挈领地写完了五十七页规模的德文打字稿。他之所以采取这一解决方法，可能有两个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他在着手撰写每一部较大作品前总是先写提纲，在这里他同样采用了这个方法；另一方面，下述考虑也许更为重要，即：由于无法查阅图书资料，反正他不可能写出一本周密的、在事实方面无懈可击的书来，提纲式的草稿可使每个人自行研究细节问题。这样的研究工作在他生前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当发现卢卡契在完成手稿后已不能再从事书写工作时，必须为他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就这样，在三月至五月间，艾尔采贝特·弗策尔和我采访了卢卡契，并把谈话都录了音。在我们面前放着他那份打字手稿，我们对需要解释、补充的提示和表述提出了问题，用这种办法形成的近一百五十页匈牙利文稿，绝对不是前后一致的。五月谈话抓住了时机，赶在卢卡契停止说话前录了音，使他本人尚能以最后的精力目睹这一切。通过这几次谈话，许多重要的问题得到了澄清，提纲的许多地方得到了补充、阐明和具体化。出自对病在旦夕的卢卡契的好感和同情，我们

才出了这个主意，这项工作之所以具有深远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作出了多大贡献，而应归功于我们采访对象的超凡毅力。

IV

我认为，按年月顺序和有条理地介绍《过去的思想》是没有必要的，我只想从全文中选择几个问题，以此来反映在某些有争议的和重大问题中所持的立场。首先让我们略花几笔来分析一下在这些片断的记述中反映出来的个性：“在我这儿的每一件事都是某一事件的延续，我相信，在我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非规律性的因素。”在与卢卡契进行录音谈话时，偶尔可听到这种自豪的语句。他的简略自传确实反映了他那协调一致的性格。在童年时代，卢卡契就反对大资产阶级的那套“礼节”观。他的作家生涯一开始，就受到了伟大的匈牙利诗人恩特雷·阿迪的批判精神、完整的要求和非暴力的革命主义影响，使他在以后学习研究德国哲学的过程中掌握了无与伦比的综合手法：他那保守的认识论与激进的伦理论结合在一起，使他在评论匈牙利和欧洲政治时，总是超越所有“受权力保护”的各种集团的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深了他对现存的政权、机构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的蔑视，是它们狂热地把世界推入灾难的深渊，使整个世界完全处于罪孽的笼罩之中，只有俄国革命才带来了一丝希望。卢卡契早期学习过马克思著作，因而对世界的转折有了思想准备，在战火

纷飞的年代，他终于见到了人类的美好前景。经过短时间的、却也十分激烈的内心斗争以后，他立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直至晚年他还保持着对运动的忠诚。在《过去的思想》中，对这一转折作为中心枢纽加以描述，“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也是我长期发展的结果。”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例如对他那些世界闻名的、直至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只是由于它们为这个转折作了准备，才引起了他的兴趣。从这个时候起，他把自己唯心主义书籍作为这样一位思想家的作品来处理，他无疑富有才华，但在很多方面散布了有害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有力的批判。他把自己此后的发展视为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所走过的道路，一方面越来越完善地掌握了理论，另一方面时而通过内在因素、时而通过外界影响逐步适应客观实际。这一发展道路最后归结于改革和复兴马克思主义，反映在两部系统的巨著——《美学》和《实体学》里，这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在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这两部著作有资格宣告我们的改革工作业已开始，第一个高潮已经到来。

这一漫长的道路是由同一个人走完的。卢卡契在十八岁那年，放弃了当一名作家的志向，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甚至经常向编辑出版工作最基本的原则宣战，他在最后一本未完成的作品中，成功地阐明了客观的统一，它反映了卢卡契本人的个性。在《过去的思想》一书中，除了很多其他事例外，也可读到他很早就对母亲不满的章节：“与母亲展开游击战；近八年的暗室禁闭。父亲：放出来，不需要道歉”。在录音交谈中，卢卡契对这段话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我开展了

反对母亲的游击战，原因是她对我们太严厉。我们家里有一间木房暗室，这是妈妈惩罚我们的手段之一，她常常关我们禁闭，直至我们向她求饶为止。我的兄弟姐妹一听到关禁闭就立即求饶，而我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她在上午十点把我关进暗室，五分钟以后我就求饶，这样就万事大吉。我的父亲下午一点半回家，我母亲尽量要避免父亲回家时出现紧张空气，根据这一情况，如果我在一点钟以后关禁闭，不论什么大事小事，我都不求饶，因为我知道，反正一点二十五分我就会被释放出来，不需请求原谅。”这一逻辑对以后开展自我批评影响极深。童年时代的游击英雄和成年游击队员是一致的，只有当他们估计到救人的父亲也许不能及时回家，他们才作自我批评。一九五六年以后，当有人无法把他开除出党（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接纳他入党），而且也无法逮捕他时，他断然拒绝了作自我批评。卢卡契对自己的这一性格特点是一清二楚的，他对童年时代的叛逆精神作了如下评述：“事先反抗——但事后又屈服，这与我无缘；如果成年人不惹我的是非，我却表示屈服，我认为：毫无意义。”当他后来分析到，为什么他在短期内不得不收回他一九二九年写的《“布鲁姆”纲领》，以维护自己的党籍、甚至生命时（这个纲领为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描绘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前景，以替代无产阶级专政），他写下了以下典型的语句：“以匈牙利党的方式限制不可缺少的批评的尝试；（……）因此：无条件地投降于匈牙利路线（实际上反正没有任何希望）。”这一思考方法与对付暗室是相同的，从两种不同的困境中向我们发出了同样调皮的斜视目光。

V

一些反映苏联案件问题的提纲式语句，至今仍令人震惊：“对干部的大屠杀时期，表态，灾难时期的走运，(1)一九三〇年的布哈林—拉达克；(2)匈牙利运动；(3)住房。”卢卡契认为，他个人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其主要原因正是这三件事的巧合。其一，一九三〇年间，布哈林和拉达克很想与他接触，他却不愿与他们会面。卢卡契认为，如果他在一九三〇年与他们二人会面的话，八年以后也许会被因此而被镇压。他处事慎重而有远见，他一直为此而感到自豪，他的确没有理由为下列事实而羞惭：他本来就一直认为拉达克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物，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对以理论家自居的布哈林已作了尖锐的批评，那正是布哈林登峰造极的时期。因此说，他并非出自机会主义的原则而回避与拉达克和布哈林的会见。当然，他对这个时代也许没有更恐怖的话可说，这样的会见必然会导致判处死刑的严重后果。其二，他也因布鲁姆纲领失败以后不得不退出匈牙利运动而走运，要是他继续留在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话，他不是被匈牙利党魁贝拉·库恩所杀害，就会被库恩的敌人所谋害，连库恩本人也未能幸免。卢卡契早就指出了库恩的这种不良意图，当时他写道，在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以后，库恩让奥托·科尔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留下来做地下工作，这是不怀好意的，因奥托·科尔文担任过人民内政委员，白色恐怖分子最恨他；他身体畸形，很容易被人识别；他是一